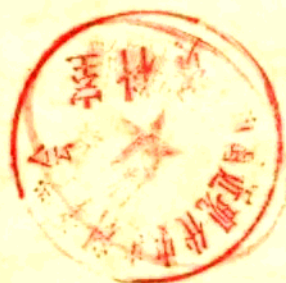


239.01 6

周至文史資料

第二輯

征求意见稿



政协周至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一九八五年元月

目 录

秦岭守备区的始末·····	张士智（遗稿）（1）
何文鼎先生与贺龙元帅的一次会见·····	尚万仁 供稿（7）
一桩惊心动魄的往事 ——记吴新田部的军阀暴行·····	李云青（10）
李二曲·····	刘季祖（15）
宗教爱国人士李伯渔先生·····	王日宣（32）
黑惠渠史略·····	孙钟麟（35）

秦岭守备区始末

张士智（遗稿）

一九四八年冬，胡宗南在关中地区节节溃败，为了预先安排他的逃路，遂有秦岭（即秦岭中部守备司令部）、宝鸡、阡山三个守备区的设立。

秦岭中部守备区司令为何文鼎，宝鸡守备区司令为徐经济，阡山守备区司令为李梦璧。胡宗南对这三个守备区在人事安排上各有其不同的特点。胡的如意算盘是：李梦璧是关中西路人，在西路地主土匪武装中有一定的吸引力，故派李为阡山守备区司令，认为进可固守阡陇一带，退亦可以扰乱西北野战军的后方。徐经济是临潼人，奸滑成性，诡计多端，在其充当省保安副司令时，即与各地土匪、地痞、流氓相勾结，故以之为宝鸡守备区司令，如他能把自己所能够结合的孤群狗党发动起来，进可以巩固宝鸡守备，败则化整为零，在关中西路各县从事扰乱。何文鼎是周至人，派为秦岭中部守备区司令，胡宗南妄图利用何的地方关系，把守秦岭通往陕南的交通要道。胡幻想把这三个守备区紧密地联系起来，守住关中迤西地区，配合其正规部队，进行垂死挣扎。万一军事再行失利，亦可以掩护其部队由终南山口南逃，而变各守备为扰乱关中之根据地，徐图死灰复燃。

那时我适由国民党陕西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卸职家居，因与何文鼎系同乡同学，他邀我帮忙，先给我以高级参谋名义，后又荐我任副司令。兹就记忆所及，追述当日情况，疏漏难免，希望身与其事者，

予以指正。

一、秦岭中部守备区之编制及其兵力部署

秦岭守备区所辖为长安、户县、周至、眉县、佛坪等沿秦岭的几个县。何文鼎系周至人，地理、人事都比较熟悉，为了便利指挥和扩充，确定守备区司令部设于周至。司令部除司令、副司令外，参谋长为吴筱五（河北省人，何的旧部），参谋处长先为侯致雄（周至人，何的旧部），后为朱西庚（礼泉人，何的旧部），副官处长蒋育德（户县人，何的旧部），军需处长武绂符（渭南人，何的旧部），政训处长王恒芳（富平人，国军长官部派来的），军法官徐子进（周至人，何的旧部）。部队则以所辖各县的保安团队和收编地方的恶霸地主、惯匪、土豪、劣绅等武装并搜罗民间枪枝编组而成。如在眉县收编恶霸地主汤翰如、劣绅张子封、惯匪陈狗旦等。何并通过私人关系，拉拢和收编了他的旧部下岳耀堂（兰田）和老朋友朱斋（户县）等。至于在周至收编的小股地方反动武装，为数更多。截至解放前夕，除所辖各县保安团队归其指挥外，并七拼八凑成立了侯致雄、朱西庚、张明珊、段正斌、吴新吾、张子封、岳耀堂、武良汉等八个团、两个独立营及司令部直属两个警卫连。这些部队多系地方反动武装或拥有枪杆子的人凑合而成，最大的团只有四百多人，三百多支枪，最差的团仅有百余人，八、九十支枪，总计全守备区官兵约二千五、六百人，枪约一千二、三百支。但对外号称七、八千人，空缺达三分之二以上。

部队成立后，张子封团和汤翰如的独立营驻眉县，杜世英的独立营驻户县，吴新吾团驻长安，岳耀堂团在兰田成立后尚未动，其余部队，则集结于周至县城及各镇，把地方闹得乌烟瘴气，鸡犬不宁，其扰害人民的罪恶，真是擢发难数。

一九四九年五月十八日，胡宗南由户县飞机场打电话给何文鼎说：“我马上要离开西安，尔后你们的行动，归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指挥，你好好维持部队吧”。十九日杨德亮由西安转来给何文鼎的电话，大意是：绥署在周至县城北渭河上所架的木桥，今天绥署汽车过完后，即行破坏。长安、户县、周至、眉县渭河南岸，派出部队，向北严密警戒。何接电话后的处置是：派驻长安的吴新吾团，担任长安以北渭河南岸的警戒；派驻户县的独立营杜世英部，担任户县以北渭河南岸的警戒；派驻周至的张明珊团，担任周至以北渭河南岸的警戒，并等绥署汽车过完后，将渭河上的木桥破坏；派驻眉县的张子封团，担任眉县以北渭河南岸的警戒。

五月二十日以后，由于渭北各县相继解放，毕梅轩以渭北民团指挥官名义，率领高陵、泾阳、三原等县保安团队和警察队约三千余人（内有屈振国等几个县长），退到周至东南的楼观台附近。第九区专员张德容率领武功县保安队和警察队，退到周至马召镇西南约二里的鬲斗村。五月二十四日，何文鼎在守备区司令部请退到周至的毕梅轩、张德容和几个县长以及胡军搬到辛口子的四八师师长夏玉清吃饭，并协商周至境内终南山防守任务。当时决定：黑水口以东，由毕梅轩指挥渭北各县保安部队防守，黑水口以西至辛口子由秦岭中部守备区部队防守，辛口子由四八师夏玉清部防守。

解放军未到周至以前，驻楼观台附近的三原警察队，向户县方向东去。泾阳的保安队把县长捆绑，说县长骗了他们，拉回泾阳去算帐。毕梅轩带残余的保安队，由楼观台沿终南山北麓西窜，想逃往宝鸡，行抵西骆峪被由眉县东进的解放军迎头痛击，损失很大，毕梅轩仅带残余三百人左右，由西骆峪进山向汉中方面逃去。

二、出没秦岭和随胡军西逃

西安于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解放后，接着渭北各县相继解放，渭河以南情况相当紧张，秦岭中部守备区司令部即移驻马召镇和黑水口里面的仙游寺。到五月二十五日周至的形势更加紧张，当晚和第二天早晨我先后两次与何文鼎商量，我意以为胡的正规部队已分别向西向南撤退，仅我们留在这里起不了什么作用，不如早些进山。不然我先进去，因我带着家眷，行动不便。何说：“一个军人，没有听到枪响就走，成什么话。”我看说不进去，便未再提。到了二十六日午间，何对我说：“你先进山也好。我们进山最要紧的是给养问题，虽然早已派人去办，而还没有人督促，你进山后，可以沿途督促他们速办，我看情形再决定行动。”我随即带上家眷和何所派的一连兵（约四、五十人），于当天中午十二时左右由黑水口进了山。

五月二十九日解放军约一个营，由西面到达马召镇，对驻守该镇的秦岭中部守备区部队展开歼灭性的打击，不到三小时即将守军全部击溃。何文鼎率残余之第一团及司令部人员约三百人，逃至黑水口内十多里的甘峪湾。解放军未再追击。何想在该地收容被击溃的残余部队，再行率领南逃。但各部队均系乌合之众，一触即溃，有的当了俘虏，有的投诚起义。何在甘峪湾等了三、四天，始终没有收容到残兵，而情况又日趋紧张，遂率残部南窜佛坪县境。

何文鼎逃到佛坪袁家庄后，与国民党九区专员张德容同驻在距袁家庄约二里许的一个地主家里。我因在路上略有耽延，到六月十五日才到达袁家庄约十五里的三岔河。第二天我去见何，他很兴奋地对我说：

“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马家部队已收复西安，现正在西安以东临潼、渭南一带战斗，胡的部队也分别由秦岭各口出山，配合马家部队作

战，胡与董剑已飞到西安指挥，我们须马上出山……。”我当时沉思了一下，便问消息从何而来？何说：“董剑有电给张德容，要他马上出山为大军筹粮，我决定与张德容一道出山，你的意思怎样？”我说：“情况既有这样转变，胡为什么不给我们电报？”因即建议何向长官部请示后，再决定行动。何反对着说：“我们进山也没有得到胡的指示啊！为什么人家都出山了，我们还想钻在山里，将来有何面目见人？你总想冷手抓个热蒸馍吃，我想天下事不是那样便宜的。”最后他以坚定的口吻说：“我决定马上出山，你想一下，如愿出山可以同行，否则就留在这里。”我觉得话不投机，即告辞回到我的住地三岔河。六月二十日左右，何率残部三百多人，路过三岔河，又征询我的意见，我表示请他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出山。

何出山前还做了一些准备工作，派他的军法官徐子进为周至县长，叫徐子进和政训处写了许多标语和安民布告，交前站人员沿途张贴，于六月二十四日到达马召镇，司令部即驻在该镇西门内小学校。

六月下旬，胡宗南以九十军陈子干部为第一线，在周至县城以东约五十里的白马河南北之线与解放军对峙。第二线为三十六军刘超寰部控制在眉县。九十军经解放军进攻后即准备西窜。此时何文鼎所率之残部三百余人，已开到哑柏镇，见势不佳，即先行向西逃窜，路过眉县被三十六军拦阻，强要归其指挥防守山口掩护他的部队，否则通知地方政府，不予供应给养。经再三交涉，始允放行。到达宝鸡后，奉第五兵团部命令，驻守宝鸡东南山口马营，担任该兵团右翼警戒。

这时胡宗南企图守住宝鸡，阻止解放军西进，正在布置扶眉战役。这一战役，胡以三十八、六十五、一一九军三个军配备在渭河北铁路两侧，以三十六、九十两个军部署在渭河以南终南山地区，均归第五兵团指挥。兵团司令部设在宝鸡南面的益门

镇。战斗仅一天多，在渭河以北的三个军及十八兵团部即被打垮，官兵大部被俘，仅少数残余部队，有的强渡渭河南逃，有的向宝鸡流窜，解放军跟踪追击，于七月十四日解放宝鸡，扶眉战役遂告结束。

当胡军南窜之夜，真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。各部队建制完全破坏，官不管兵，兵不找官，自相践踏，争先恐后，各自逃命，途为之塞，人喊马嘶，混乱已极。六十五军常因争先逃命与别的部队冲突，用枪打汽车和向汽车丢炸弹之事，时有发生。就这样一直跑到秦岭南脚下的黄牛铺。

胡军由宝鸡撤退后，曾指定各部队在秦岭东西之线占领新的防守阵地。但各部队一切不顾，拚命南逃，有的逃到凤县，有的逃到双石铺。后因解放军未予穷追，才慢慢地溜回被指定的防守地区。秦岭中部守备区残部随第五兵团逃到双石铺后，被指定在永宁镇（甘肃徽县境）整补。

三、双石铺会议和守备区结束

一九四九年八月中旬，胡宗南由汉中到双石铺，召开师长以上人员的军事会议。秦岭中部守备区由何文鼎亲自参加。会议召开了一个上午。会后，何对我说：“这次名义上是军事会议，实际上是胡对各部队将领的训话。不，简直是大骂了几个钟头。当胡登上讲台时，开口就说：“你们不争气，现在闹成这个样子。西安撤退是有计划的，马家部队打到咸阳附近，我们不能有力地配合马部收复西安，你们是不是要负责任？扶眉战役，各部互不联络，致宝鸡失守，你们要不要负责？宝鸡撤退后，命令占领秦岭一线布防，有的部队竟不遵令拚命南跑，跑到凤县，还有跑过双石铺的。秦岭、宝鸡两个守备区，没有配合各军作战，没有发挥作用。你们都身为师长以上的将领，真是

万分可耻！现在我们选定秦岭地区防守。秦岭是天险，易守难攻，防守得力，解放军绝难越雷池一步。如果今后那一部队防守地区，被解放区突破，定以军法从事，决不宽容。”当场命令将秦岭、宝鸡两守备区撤消，以所余部队合编为四十八师，任徐经济为师长。……。大约在会后的三数日，何把所余残部移交徐经济接收。秦岭中部守备区于一九四九年八月下旬便寿终正寝。

何文鼎先生与贺龙元帅的一次会见

尚万仁 供稿

一九五零年的元月中旬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四川成都。何文鼎将军当时任国民党第七兵团副司令长官，我是他的随身侍卫副官，因而，有幸看到了何文鼎将军与贺龙元帅在成都的一次亲切会见。会见时的情况至今记忆犹新。

早在一九四九年六月间，解放军解放了陕西关中大地，胡宗南飞逃台湾时，曾电令何文鼎配合裴昌会指挥作战。裴当时任国民党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、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，并兼任第七兵团司令长官。在退守驻地宝鸡益门镇时，司令部很多人发现有一位陌生客人，经常出入司令部，据说这位客人是司令长官的老友李先生。这位李先生一直随军到达四川广元时，才公开了身份，原来他是中共代表，要策反裴、何两将军起义的。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我们第七兵团所属部队就在四川德阳县向全国通电宣布起义。

当其时，国民党中央第一师空运出海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部向西康方面撤退，成都城防空虚，市容极为混乱。何文鼎将军连夜赶到成都，住在实业街二十九号，立即找到国民党独立团第九三六团团

长蒋松璋(长安人,何的旧部下)。何命令蒋松璋不要率其部跟李文走,并负责成都城防,保护好城内粮仓及工厂设备,不得随意破坏。又联系指挥西门外市郊的余师长、南门外的王师长和城中驻扎的曾师长,叫他们负责维持地方秩序,严防乱兵和坏人抢劫百姓、商户财物。因此,李文的第五兵团撤退时,成都市未遭大的破坏。何将军经常教导所属部队说:“战争已给老百姓造成很大损失,爱护老百姓的生命财产,是我们作军人的天职”。直到今天,我一直认为,和平解放成都,何将军为人民立了一功。

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的第二天早饭后,一个解放军的干部来到实业街29号,对我说,要见第七兵团何司令长官,我领他到上房,这位干部对何将军说“贺龙司令员叫我来请你到司令部去。”我随何将军一同坐小车去了。到成都市励志社门口下车,只见门卫解放军同志,个个精神抖擞,神态威严。当我们走到会议室门前,一位年约五十岁的解放军将领,衣着朴素,留有短胡须,笑微微地迎了出来,主动热情地伸出右手,拉住了何将军的手,笑咪咪的眼睛盯着何将军问:“靖周,你好!我就是贺龙。”我不禁吃惊,啊!他就是贺司令员,多么和蔼可亲可敬啊!他们两人眼睛对视着笑,足足有四五分钟。从面部表情看,似乎互有千言万语,却无从说起。最后,还是贺老总先开了口:“靖周,你的二公子闽生近来怎样?”一提起闽生,何将军似乎内心震动了一下,眼眶有点儿发红,深深叹了口气说:“唉!他们已经去台湾了。”贺老总似乎看出了何将军的悲凉心情,随即安慰道:“不要急,他总是要回来的。走,里边坐。”这才一同走进屋内,坐定后,贺老总问了一些有关部队的情况,两人一同去洗了澡,共进了一顿午餐。这次会面时,解放军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在座。

我当时有些纳闷，贺老总会见何将军，开口第一句，为什么先问闽生呢？他是怎么知道闽生的？

这件事，别人无从理解。我从一九四零年起一直追随何将军，经过一番回忆和思考，深佩贺老总的精细与才智过人。他和何将军在中国这块好大的棋盘上，几十年来交手多次：从华北到绥远，从关中最后转到四川，成都相见，双方能不有所回忆，但这些却都只字不提，偏偏问到闽生。这是因为他深知何将军最疼爱闽生，当然也最关切闽生，开口先问闽生，似乎就是对一个多年交手，处在战乱中的老朋友的高度关心，以此来表示慰问。问题是：贺老总怎么会知道何将军最爱闽生呢？

原来一九四五年冬，何将军任国民党六十七军军长，率部开往北平（即北京）接城防，行军中途，在绥远集宁市以东的卓资山，被贺老总指挥的一次伏击战，打了个全军覆没。幸亏何将军及军直属部队只留下的十九个人，突出了重围。侍卫副官张士杰被俘了，张士杰随身携带何将军的私人用物，特别象大小日记本、公文、印信等。别的东西都无关要紧，日记是一个人思想动态与生活情绪的纪录。何将军疼爱闽生的心意自然而然地要多次出现在日记里。解放军政治部在研究国民党将领们的处事为人时，自然要作汇报。贺老总怎能不知道何将军最爱二公子闽生呢！

（编审组整理）

一桩惊心动魄的往事

——记吴新田部的军阀暴行

李云青

这桩往事，距现在已经半个多世纪了。虽然事隔近六十年，但我却记忆犹新。

这桩事发生在军阀混战的年代。军伐相斗，国无宁日，兵、匪骚扰，人民遭殃。我的家乡——周至是受灾最重的地区之一。我的家乡南有高耸入云的终南山，北有武功、兴平两县辖境的马场渭河滩。山沟、河滩，时有土匪出没，抢劫财物，拉走牲畜，甚至烧烤逼供财物，拉票勒索。每年被兵、匪烧死、杀伤的难计其数。

就拿我家说吧，先后被抢近十次（时间都在深夜），我父我叔我四弟都先后被兵、匪烧伤、杀伤。还有一次，匪徒认错了人，竟把我家长工老六绑在明柱上打得遍体鳞伤，瘫痪了半年多才恢复健康。在我们家庭中，我是幸运儿。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七年，我在我县高等学堂、西安成德中学和武昌师范大学上学，一直住在城市里，始终没有和兵、匪接触，因而也就没有领教过兵和匪的凶恶残暴行径。

古谚说：“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事”。一九二五年暑假中的

一天，军阀吴新田部队的两个士兵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一个揪住我的臂膀，一个端起步枪，扬言非枪毙我不可。我从来不曾同兵、匪打过交道，对这突如其来的惊险现实，不禁胆战心寒，手足失措。及今思之，也还心有余悸。为了叙述这桩往事发生的原由、经过，还得从头说起：

一九二一年六月，军阀吴新田（陆军第七师师长）率部随陕西督军阎相文入陕。不久，阎自杀。冯玉祥将军（十一师师长）继任陕督，调吴部开赴陕南。吴盘踞陕南八年，曾两次出秦岭来关中，与军阀刘镇华狼狈为奸，祸害陕西人民。

吴到陕南后，北京军阀政府加委吴为陕西军务邦办。一九二四年冬，吴率部驻军关中。一九二五年二月，胡（景翼）阎（玉昆）战起，刘镇华率镇嵩军出关督战，以吴代为“照料”督军、省长职务。及刘失败投靠了山西军阀阎锡山，段祺瑞临时执政，政府于同年四月间任命吴新田为陕西督军兼省长。吴正式总揽了陕西军政大权之后，更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，为所欲为了。

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午后，省立一中（校址在西安庙后街，即现在的西安市二十五中）两班学生比赛足球时将球踢出场外。九个同学爬上操场墙头，看见驻在西仓里的第二十八团军人抱球向营房奔跑。学生向军人索球，抱球的军人把球抛给营门站岗士兵后，将索球学生按在地上拳打脚踢。其他同学见状，纷纷上前说理。抱球军人见学生越聚越多，便大喊大叫，于是营中吴军蜂拥而出，拉住学生乱打。学生不甘示弱，也进行还击。这时有一军官由外回营纠集大批武装官兵，并命令号兵吹冲锋号向一中冲去，捣毁了操场西门，闯进了学校，逢人就打，见东西就毁。这时督府官员某适从墙外经过，闻声进校，始命

吴军官、兵全部退出。据统计，挨打学生近百名，负伤三十余人，八人伤势严重。当天晚上，一中师生开紧急会议，提出：惩凶、负责医疗受伤同学、赔偿损失和保证学生安全等条件，要求吴军照办。一中学生会又决定从五月五日起罢课，并建议省学联呼吁各校一致行动。从此陕西学生掀起了轰轰烈烈地驱吴运动(注)。

西安各中等学校学生一致罢课后，省学联又散发宣言，张贴标语，争取各界同情支持。吴新田除将驻扎西仓的二十八团调驻灞桥外，对其他条件，概未理睬。同时，西安街上，还不时发生军人刁难、辱骂、殴打学生的事件。这种事件，我也亲自领教过。

我是一九二五年七月上旬由武汉起程回家度暑假的。同行的有武昌师大、上海大学陕籍同学六人。由于这年夏季雨水偏多，道路泥泞，铁轮大车无法行走，我们就由潼关雇乘邮骡回省。刚到西安东梢门，哨兵老远就吆喝“下来！干什么的”？我们异口同声的回答：

“学生”。他们的神色忽然变严厉了，在反复检查包裹行李之后，又进行了搜身。最后对我和另一位戴近视眼镜的同学大加责备，说什么到了这儿还不卸眼镜，什么玩艺！经我们仔细解释一番之后，才被放行。

由于吴部对学生处处为难，一九二五年五月中旬西安各中等学校暂时解散，省学联也迁往陕军驻地三原，接着召开了全省学生代表大会，通过了决议案，出版了揭发吴新田罪恶、报道驱吴运动实况的刊物《血泪》，并组织宣传队到富平等县宣传。因此，吴部官兵从上到下都很仇视学生。

陕西学生驱吴运动，规模浩大，坚持了两个多月。同时陕军和国民军各部也发动武装战事。一九二五年七月上旬，孙岳、李云龙部逼近西安，杨虎城、甄寿珊部由耀县南下，西路兴平、武功、扶风等县

还驻扎着陕军，吴陷于绝境，遂于七月十五日夜放弃西安，向汉中老巢逃跑。

七月十七日上午，我村——下天屯村南边官路（即今西宝公路）上密密麻麻的军队向西开动。官路上过军队是司空见惯的事，谁也没有加以注意。这时我和家人围坐一起，谈叙阔别两年的情况，说说笑笑，十分欢快。村人某忽然发现部分军队抄小路向我村走来，在惊慌中，奔走相告。于是全村男女老少都惊恐、骚动起来。我的父母更加焦急不安。因为他们既想藏好家中财物，又想藏好我。这会儿我简直成了双亲的沉重负担了。他们紧张而又惊恐地对我说：“军队到村子来，一定没好事，你赶快到咱村东马道那个长满蒿艾的空园子里躲躲，免得……”我立即遵办，一口气跑到那里，钻进蒿艾最茂密的地方。不久，就发现几个壮年小伙子已先我钻到那里了。大家不约而同的屏息敛气，生怕被人发觉。

过了一会，突然闯进两个背枪军人，大声喊道：“不准动，谁动就枪毙谁！”不用说大家都唯命是从。他俩的四只凶恶眼睛，都盯着穿学生装留平头的我，指着问道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？”我说：“学生”。他们恼火了，一个揪住我的胳膊不放，一个提着钢枪匆匆忙忙地钻进蒿艾丛里搜索了一阵，接着把枪端在手里，对准我的脊背边走边骂：“学生，坏蛋！你跟老子作对，老子今天就要枪毙你，枪毙你这个王八羔子……”。我自生以来，没有经见过这样险恶的场面，因而始则战战兢兢，不知所措，生怕人家扣一下枪机，结果了性命。继而想到这是无可挽救的事，听天由命吧。便被人家拉着胳膊从村东头向西走。

这时，我村乡约（当时的村行政领导）李英会老汉目睹这种情况，

耳听这些语言，他着急了！立即约同几位老人，跪在这两个军人面前求情说：“两位老总，不要生气，这娃是我家堡子顶乖的娃。他在项口（汉口）上大学堂，已经两年了，大前天才回来，请老总饶了他吧……”接着又来了几个好心肠的邻居也都跪下求情，不知叫了多少声老总，说了多少句告饶的话，他们才松了手，逼我立即回家。当然，脱离了威胁，我有点坦然了。

谁知我向家中走着，他们却尾随在后边也到我家。一进门就看见箱翻柜倒，衣物狼籍，鸦片烟汁（俗名烟油）滴洒满地，知道我家财物已被先来的军人抢走，他们没有再翻腾，却飞身上楼，找到我刚从学校带回来的一口小皮箱，放在院子。一面问我里面放的什么，一面急不可待地用刺刀刺破箱盖，翻乱了其中的书籍、照片，拿走了友人田某给我画的几幅水彩画。

吴部在我村排门挨户的抢掠了两小时左右，抢走了许多鸦片烟（又称大烟）和衣物，拉走了近二十匹骡马。他们把抢到的东西搭在骡马背上匆匆忙忙地向西逃跑了。匆忙的原因当然是惧怕孙、李、杨、甄等军的追赶和驻在武功、兴平一带的陕军卫定一部的截击。

当时大烟价值昂贵。吴军抢劫的主要对象就是大烟。他们把抢到的大烟装在农民盛粮食的口袋，搭在牲口背上驮走。大烟汁从口袋两头流洒在路上，形成了两道黑印子。这两道黑印子由我村一直延伸到数里以外的官路上。村民的损失，真是难以数计呀！

吴军走后，我村呈现出一片凄惨景象：有些人垂头丧气，有些人长嘘短叹，有些人相对啜泣，有些家人嚎啕大哭。我家的财物被抢光了，全家老少都非常沮丧、难过，有“不可终日”之感！及至听到我被两兵捉、放的惊险经过之后，却不禁破涕为笑了。

（注）见吕颖荷：《陕西学生驱吴运动回忆》。这篇文章载《陕西文史资料》第十一辑。

李 二 曲

刘 季 祖

李二曲是我县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，在明清之际，他和黄宗羲、孙寄逢齐名，被人们誉为“海内三大儒”，又和眉县李柏、富平李因笃一起，合称“关中三李”。

二曲是有全国影响的人。号称一代开山、一代宗匠的顾炎武，对二曲就十分推崇，曾说：“艰苦力学，无师而成，吾不如李中孚”。他还远千里，登门造访二曲，质疑问难，谈经论史。二曲通过讲学，不仅在关中陕西留下了深远影响，也在祖国中部及大江南北广大地区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；不仅在当时，也在辛亥革命时为许多志士仁人所啧啧称道。

二曲的苦学成才

李二曲名颢，字中孚，因地取号，人们都称他二曲先生。公元一六二七年，也就是明王朝末代皇帝崇祯的哥哥朱由校做皇帝的最后一年，即天启七年，农历正月二十五日，他出生在县城内一间破旧不堪的茅房里。他的父亲叫李可从，为人正直，好习武艺，在二曲十岁那年，和原来在周至任过县令、后来做了西安同知的孙兆禄一起，跟随当时的总督陕西都御史汪乔年，出关到河南“讨伐”李自成农民起义军，腊月二十四日离家，到第二年的二月十七日就一同在河南襄城“战死”了。家里留下二曲母子二人，“茕茕在疚，形影相吊，无一椽寸土之产”，原来在县城住的破烂茅屋，也因交不起房租，被房主